

## ※採訪報導※

# 夜訪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張湧泉教授

### 鄭卜五\*、楊濟襄\*\*採訪記錄

「晚清經學之研究」第四年子計畫「浙江地區的經學研究」，從二〇〇五年四月七日至十八日，展開赴浙江考察經學家遺跡的工作，每天都是滿滿的行程。

今天（四月十日）已經是在杭州的第四天考察活動，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及蔣秋華教授的帶領下，大夥兒經過一整天的探訪考察，回到杭州的浙江大學專家樓西溪賓館時，已經晚上九點鐘了，由於明天就要離開杭州，如果再不訪問「傳奇的張九段」——張湧泉教授，此次的浙江學術訪問之行，將是最大的遺憾。因此，在返回賓館的途中，林慶彰教授便先請託北京中華書局柴劍虹教授代為轉達，邀請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張湧泉教授至西溪賓館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張湧泉教授，出生於一九五六年，大陸敦煌文獻領域中研究成果最專精，且最為豐碩的研究者之一。他現在是浙江大學享有九級最高崗位津貼的知名教授，所以浙大的老師們常尊稱他為——「張九段」。在本次訪談中，張教授與我們分享了他個人求學歷程的心得，及他對敦煌文獻研究的經驗和目前正在計畫進行的研究方向，並暢談兩岸學制以及正體字、簡體字在做學術研究時的影響。張教授更期勉研究者要有開闊的眼界，才能開創新的研究局面。

張湧泉教授回憶起他求學時的情況：

一九七八年中共恢復高考制度，張先生成為杭州大學恢復制度後的首屆大學生。張先生在大學二年級時，選修郭在貽教授所開設的古代漢語課程，從此之後就迷上了「小學」。起初，張先生對當時郭教授的印象是一位中等的個子，說起話來

---

\* 鄭卜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

\*\* 楊濟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還帶著濃重的山東口音，看起來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但是，後來上了郭教授的課，才深深地發覺郭教授淵博的學識及關懷學生的親和力。尤其他那生動的講授，大大地激發了學生們求知的欲望。張先生回憶起每次聽郭教授上課時的情況，就像是一場古代漢語藝術的饗宴，所以張先生總是早早地趕到教室，期待著上課的來臨。從那時起，郭教授便成了張先生仰慕的對象。在兩個學期後的古漢語課結業考試時，平常默默耕耘的張先生，竟然得了全年級的最高分，這使得郭教授深感意外。郭教授對張先生能取得最好的成績，深表祝賀，並懇切地勉勵他日後當更努力用功，以發揮其才能。受到郭教授的鼓勵，張先生對古代漢語的興趣被鼓動起來，從此他便熱衷於「小學」的研究，而難以自拔。

在郭教授的指導下，張湧泉先生開始閱讀一些小學方面的名著，諸如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等等，都是張湧泉先生精研的書籍，這為張先生現今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張湧泉先生開始閱讀杜甫詩及其他唐詩的選注本，其中如明朝王嗣奭的《杜臆》、清代仇兆鼐的《杜詩詳注》、楊倫的《杜詩鏡詮》、施鴻保的《讀杜詩說》等著作，張先生都仔細地一一看過，並認真地做了筆記。張先生把閱讀杜詩的一些劄記心得，送給郭教授看，郭教授極表讚賞，並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見。張先生便把它們整理成文章，郭教授還特別寫了一篇書面意見，將張先生的文章，推薦給杭州大學首屆文科學生論文報告會，後來又推薦給學報發表。在那幾年中，張先生陸續寫成數量頗為可觀的讀書劄記。

張湧泉教授說，記得當時，他在一篇文章中把單人旁的「俗」寫成了雙人旁，郭教授還特別用紅筆在旁邊寫了個大大的正字，並加上圓圈。郭教授語重心長地對張先生說：「別看錯個字是小事，編輯看了，就會覺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會給你發表了。」郭教授嚴謹的為學精神，深深影響張先生的治學態度。

張湧泉先生曾經恭讀過郭教授的論文手稿，見郭教授用毛筆小楷，一筆一畫，極其工整地書寫。文章中所有的引文都詳細注明書名、版本、卷次、頁碼，郭教授謹嚴樸實的學風，給張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八一年底，張湧泉先生結束了四年的大學生活。郭教授極力推薦張先生留校任教，但由於種種原因，張先生被分派到了遠離杭州的一個小縣城工作。郭教授用毛筆寫下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十四個大字來勉勵張先生。

一九八三年春天，張湧泉先生出差回杭州，在郭教授鼓勵下，張先生報考研究

生班。在郭教授和其他杭州大學老師的關心與鼓勵下，一九八四年張先生以優越的成績考進了杭州大學古籍所的研究生班。

在攻讀研究生的兩年期間，郭教授很有系統地為學生講授了訓詁學、俗語詞研究等基礎知識，並介紹治學的經驗和方法。郭教授常對學生說：「不要急於述作，要緊的是打好基礎，要甘於坐冷板凳。做學問要注意根柢之學，對幾種小學名著，必須紮紮實實地精讀一、二種。」郭教授說他自己曾把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從頭到尾，認認真真地讀過幾遍，這使他受益終身。

一九八五年春夏之際，張湧泉先生開始通讀郝懿行的《爾雅義疏》。正好上海古籍出版社擬議出版《清十三經注疏》，約請郭教授校點《爾雅義疏》，郭教授便讓張先生和他合作，校點該書。在郭教授指導下，張先生先把《爾雅義疏》通讀了一遍，又在自己用的本子上校點一遍，然後再逐錄到定本上。《爾雅義疏》的引例十分豐富，全書引例約有三萬餘條；張先生發現這麼多的例證，並非都出自第一手資料，有一部分是郝氏據《經籍纂詁》等書轉引而來的，存在著不少錯誤。張先生逐字逐句查核了郝書所引例證的原文。這項工作從一九八五年下半年開始，到一九八七年底完成，整整花了張先生兩年的時間。由於當時的出版事業並不景氣，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取消了整套書籍的出版計畫，但這種紮實的工作，讓張先生真正的學到了一些根柢之學。張湧泉教授說：「這件事仍然覺得是很值得的經驗。」

一九八五年的暑假，張湧泉先生陪母親到上海治病，隨身攜帶了王重民等先生編輯的《敦煌變文集》上、下冊。當他抽暇讀了一遍之後，張先生發現該書校勘方面存在著不少問題。張先生想，造成這麼多問題的原因何在？其間有沒有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可以總結？回杭州後，張先生將自己的想法向郭教授作了彙報，郭教授大為讚許，他要張先生把《敦煌變文集》再認真地看過一遍，將心得寫成一篇專文。後來郭教授因病住院，仍不時地關心著文章的書寫情況。張先生每寫成一條，郭教授就叫張先生讀給他聽，後來郭教授的病情稍好，郭教授就讓張先生帶著文章的初稿，陪他到醫院外面走走。在洪春橋邊的茶室、植物園中的小亭、飛來峰下的石礮，郭教授抱病為張先生審讀論文的情景，至今張教授仍歷歷在目。

當張湧泉先生〈敦煌變文校讀釋例〉的文章寫成後，郭教授寫了一篇很長的評語，並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正體現了郭教授對年輕學子的用心栽培和殷切的期望。在郭教授的大力舉薦下，這篇長達三萬餘字的論文，分上、下篇分別在《杭州大學

學報》和《敦煌學輯刊》上刊出。

張湧泉教授說，他在撰寫〈敦煌變文校讀釋例〉一文的過程中，曾把《敦煌變文集》裏的一些疑點與敦煌變文的寫本原卷（依據縮影微卷）核對了一遍，結果發現該書的疏誤，大多與編者的誤錄有關。而當時學界已發表的大量校勘、詞語考釋等的敦煌學論著，大都依據《敦煌變文集》的錄文，並沒有認真核對過敦煌寫本的原卷，以致鄧書燕說的例子不勝枚舉。而且這些論文散在各個報刊，讀者查檢不便。張先生覺得，如果能彙輯各家的校說，並核對敦煌寫本原卷，再編輯成一本敦煌變文的新校本，那該有多好啊！張先生把想法向郭教授作了彙報，郭教授極表讚許。由於這個校讀項目規模很大，正巧當時黃征先生也在郭教授的指導下，從事王梵志詩校勘的研究，熟知敦煌文獻，於是郭教授便決定由他們三個人合作編撰《敦煌變文彙校》一書。

一九八七年四月，在杭州富陽舉行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年會時，於大會上，郭教授正式提出了編著《敦煌變文彙校》一書的設想，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回響。當時，呂叔湘、項楚、王鐸等著名學者，都對這項工作表示積極的支持。後來郭教授又和他們一起討論，提出編著《敦煌變文集校議》和《敦煌吐魯番俗字典》二書的計畫，加上《敦煌變文彙校》，將可成為郭教授和張湧泉先生、黃征先生合作撰著的「敦煌學三書」。

張湧泉教授說，「三書」的設想和寫作步驟，大致是依循：一、在前人校勘的基礎上，通過核對敦煌本原卷，對《敦煌變文集》的失誤，逐篇寫出補校論文，並在刊物上公開發表，以廣泛徵求各方意見，然後修改並系統化，用以完成《敦煌變文集校議》一書。二、在《敦煌變文集》的基礎上，增補其所未備，並彙輯各家校說，然後根據研究心得，加以按斷，以形成集大成的《敦煌變文彙校》一書。三、廣泛調查蒐集敦煌、吐魯番寫本中的俗字，並與傳世字書、碑刻等文獻中的俗字材料相互印證，上討其源，下窮其變，勾勒出每個俗字的淵源流變，以完成《敦煌吐魯番俗字典》一書。

一九八七年春夏之交，「三書」之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的撰著工作正式啟動。他們首先複印了所有當時能蒐集到的敦煌變文研究方面的論著，並把與校勘有關的部分，按《敦煌變文集》的頁碼，逐篇、逐句、逐字地剪貼彙輯在一起；然後藉助閱讀器，把《敦煌變文集》所收變文與寫本縮影微膠卷核對過一遍，並做了詳細的記錄。在此校核記錄的基礎上，他們便開始逐篇撰寫補校論文。黃征先生負

責《敦煌變文集》上冊各篇補校論文的撰寫，張先生負責下冊各篇補校論文的撰寫，初稿完成後，互相交換校閱一遍，再呈交郭教授審閱，最後由執筆人負責寫定。

在郭教授的悉心指導下，一九八八年初，張湧泉先生已有多篇論文寄交各刊物發表。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郭教授在寫給西北師大趙達夫教授的信中說道：「弟與張、黃兩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寫的敦煌學三書，其中《敦煌變文集校議》一稿將於年底完工，全稿約三十萬字。此稿專談我們自己的看法，自信不無發明，其中俗字和俗語詞的考釋方面，尤多獨得之秘。」郭教授對他們二位的研究成果，深予肯定。

一九八九年初，正當《敦煌變文集校議》全書即將完稿的時候，張教授最敬愛的郭在貽老師卻匆匆地離開了人間。當時，郭教授躺在病床上，還多次和他們談起「三書」的撰著、出版，所當注意的事項。其情其景，使學生們感到無限的悲痛。張教授談到此時說：「郭老師關注『三書』撰著及出版的情景，真是催人淚下。」

張湧泉教授為了完成郭在貽教授的遺願，在許多郭教授生前所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們的關心和幫助下，郭教授的學生們把郭教授的遺稿，整理結集為《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郭在貽敦煌學論集》及《郭在貽文集》，已分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版。「敦煌學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一九八九年底完稿以後，次年十一月即由嶽麓書社出版。該書後來榮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和國家新聞出版署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張湧泉先生和黃征先生便開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敦煌變文集校》上來。考慮到敦煌變文寫本多俗字、俗語詞，此類字詞，識解匪易；字典辭書，又多告闕如；以往校錄的失誤，又往往與這類字詞有關，要糾正這種失誤，必須指出失誤的原因，纔能使讀者信服，所以他們決定在彙校的同時，適當增加一些注釋的內容，對那些字面生澀而義晦的詞句，或字面普通而義別的俗字、俗語詞，酌加箋釋，以便利讀者閱讀。姜亮夫先生在《敦煌變文校注》序文中稱道，「《敦煌變文校注》重在俗字、俗語詞之詮釋，以俗治俗，勝義紛紜」，姜先生一語道出了該書的特色所在，這也是他們後來把書名由「彙校」改為「校注」的原因。《敦煌變文校注》的另一個特色在於「彙校」。他們把當時所能見到與敦煌變文校勘有關的一百多篇論文及著作中的重要成果，全部薈萃於「彙校」中，並加以自己的按斷，既免讀者翻檢之勞，且能看出各家校說的優劣短長所在。姜先生於序

文中稱該書「為敦煌變文校理之集成之作」。他們在逐字逐句校核敦煌變文寫本原卷的同時，還注意歸納總結敦煌寫本的書寫特例，並體覺到用這種特例，足以用來指導敦煌變文的校勘工作，從而可以糾正前人在這方面的不少疏誤。

《敦煌變文校注》的撰寫，共花了張湧泉和黃征先生兩年多的時間，一九九二年初，《敦煌變文校注》全書定稿完成，一九九七年五月，這部一百六十多萬字的著作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得到學術界相當高的評價。該書榮獲新聞出版署優秀古籍整理圖書獎一等獎、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和首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及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三、四年間，是張先生心情最感鬱悶的時期，他難以從遽失恩師的悲痛中擺脫出來。正在張先生迷惘困頓之際，著名敦煌學家項楚先生伸出了救援之手。一九九二年春，在項教授的鼓勵下，張先生參加四川大學的博士生入學考試，並順利地獲得錄取。

在四川大學期間，張湧泉先生感受到川大到處都是燦爛的柔情與陽光。從中文系的領導到學校有關的各部門，他們對張先生這個「老」學生，從各個方面給予了特殊的照顧與協助。

張湧泉教授談到，師母何建華教授從生活上給了許多關懷，也很感念師友周裕鍇、朱慶之、劉利、張勇等人，在學業上給予很大的幫助。當時中文系的一些著名學者，像楊明照教授、張永言教授、趙振鐸教授、龔翰熊教授、經本植教授等，也都給了張先生許多關懷和教導。面對這許許多多的關愛，張先生深深地感覺到只有自己加倍的努力，才是最好的回報。張教授說，當時他用屈原〈橘頌〉「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的名言來自我勉勵，在求學期間，他不敢稍有懈怠。

在四川大學不到兩年的讀書時間裏，張先生除撰寫了一些單篇論文外，還完成了三十萬字的《漢語俗字研究》以及近七十萬字的《敦煌俗字研究》的初稿。

張湧泉教授說，早在八十年代初，在閱讀敦煌卷子的過程中，發現其中有許多殊異於後世刻本的特點，就是俗體字很多。但由於種種原因，俗體字的研究是我國文字研究中最為薄弱的一個環節；而敦煌俗字的研究，更是幾乎等於零。所以當時張先生便把研究的重點，放到了俗體字上面。在郭在貽教授的指導下，曾撰寫了〈敦煌變文整理校勘中的幾個問題〉、〈俗字研究與古籍整理〉、〈俗字研究與敦煌文學作品的校讀〉等一系列與俗字相關的學術論文。

當時，郭在貽教授曾對他說：「俗字的研究是一個前人不曾措意，卻又十分重

要的研究領域，值得下大力氣做更進一步的研究；將來這方面的材料積累多了，可以寫一部概論性的著作。」張湧泉教授《漢語俗字研究》的寫作，便是遵從郭教授的遺囑，從一九九二年初開始著手進行的，後來《漢語俗字研究》入選為《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主編）第一輯中唯一的一種語言文字學著作，一九九五年四月由嶽麓書社出版後，《中國語文》、《中國圖書評論》、《古漢語研究》、《語文建設》、臺灣的《漢學研究》、香港的《大公報》等刊物紛紛發表評論。許嘉璐先生主編的《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認為該書乃：「迄今為止第一部俗文字學的概論性著作，作者不僅全面地介紹了俗字學各種知識，還通過對大量俗文字資料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很多文字現象，指出了語文著作中與俗文字有關的很多疏失，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頁85-86）；香港《大公報》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稱該書「填補了文字學領域的一大段空白」；美國《芝加哥日報》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稱讚該書「其成果達到了當今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一九九五年，該書評獲為北京大學第六屆王力語言學獎。

張湧泉教授認為，唐五代是漢語俗字流行的一個高峰，而數以萬計的敦煌寫卷就是這一高峰的實物見證。張先生試圖通過《漢語俗字研究》，從比較宏觀的角度，對漢語俗字的發生、演變之歷史，以及相關的理論問題，作出鳥瞰式的勾勒；而他後來寫《敦煌俗字研究》的目的，則在於通過對唐五代這樣一個俗字流行高峰期的微觀分析，對漢語俗字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孳乳、發展的面貌作出更具體之描述，同時更直接地為敦煌文獻的校勘整理服務。

一九八九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曾組織國內外學者編寫「敦煌學導論叢書」，項楚教授推薦讓張湧泉先生撰寫「敦煌俗字研究導論」。當時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寫作計畫一直未能付諸實現。到了四川大學以後，在項教授的鼓勵下，張先生纔正式把《敦煌俗字研究》當作博士學位論文，來著手進行研究。從論文框架的建構到最後的寫定，項教授都給予張先生悉心的指導。一九九四年十月，論文提前完成，進行答辯。由蔣紹愚教授、江藍生教授、楊明照教授、張永言教授、趙振鐸教授、項楚教授等六位博士生導師所組成的答辯委員會以及論文評議人，都對論文給予最高的評價。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認為張先生的《敦煌俗字研究》「是今後讀敦煌寫本的重要參考，功德無量，與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堪稱雙璧」；裘錫圭教授認為該文是「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季羨林教授認為該文是

作者把四川大學和杭州大學這兩個敦煌學研究中心聯繫起來「所產生的優異的成果」。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敦煌俗字研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載文稱「《敦煌俗字研究》，填補了這個研究領域的空白，……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意義和方法，既有理論探索，又重實際考辨，體現了敦煌俗字研究的最新成就」；《中國社會科學》一九九八年第二期也發表書評稱該書「是一部規模宏大、新意疊出的學術專著」；北京大學蔣紹愚教授在〈近十年間近代漢語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指出：「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是兩部開創性的著作，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載於《古漢語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教育部專家諮詢委員會起草的諮詢報告在談到「九五」期間語言學研究狀況時，指出：「漢語俗字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張湧泉的《敦煌俗字研究》就是這方面的代表，它是一本高水平的著作。」（中國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網）。一九九八年，《敦煌俗字研究》獲教育部第二屆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

張湧泉先生博士畢業以後，又到北京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導師是張先生心儀已久的著名學者裘錫圭教授。

張湧泉教授很謙虛地說：「以前接受較多的是訓詁學和敦煌學、文獻學方面的教育，而缺乏文字學方面比較紮實的基礎，在北大學習期間，我聽了裘師面授的『古文字學』、『考古資料與傳世先秦秦漢古籍的整理』等課程，終於補上了文字學這一課。」張先生在北大這段期間最重要的工作，是完成作為博士後課題的《漢語俗字叢考》的寫作工作。

張湧泉教授認為，俗字研究是我國文字研究中最為薄弱的環節，現有的一些大型字典如《康熙字典》、《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等書，在俗字的收錄、辨析等方面，都還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張先生就俗字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寫過〈俗字研究與大型字典的編纂〉的長文，裘錫圭教授把它推薦到《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上發表。〈俗字研究與大型字典的編纂〉與他的另一篇文章，一起被評獲為一九九四年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二等獎。張先生到北大後，在裘教授的鼓勵下，便把《漢語俗字叢考》作為自己博士後研究期間的研究課題，試圖對《康熙字典》等大型字典，在俗字方面的缺失，進行一次總體的檢視。張先生要在兩年的時間裏蒐集有關的資料，完成這樣一部多達一百多萬字的著作，任務確實是十分艱巨。



張湧泉教授認為，在那些日子裏，他無心留戀燕園的湖光塔影，也沒有時間去欣賞古都的名勝古蹟，除了到系裏取信，去圖書館查閱資料，或與同行「哥兒們」難得的一聚外，張先生幾乎整天都把自己關在博士後公寓裏。在閱讀、考證、寫作之中，張先生把每一根神經都繃得緊緊的。裘教授和裘師母對張先生的研究工作，給予了許多關心和幫助，裘教授不但幫張先生確定了全書體例，還花費很多時間，仔細審閱了《漢語俗字叢考》的許多初稿，更提出大量寶貴的修改意見。裘教授對學生要求嚴格是出了名的，對張先生書稿中的問題，哪怕是一個字寫得不夠規範，一個標點符號用得不夠準確，裘教授都必定會一一當面向張先生嚴肅地指出來糾正。所以每次去見裘教授時，張先生都有著一種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覺。但裘教授和裘師母對張先生的生活起居及研究的進步，則是關懷備至。

一九九六年歲末，張湧泉先生總算如期完成了博士後課題的寫作，並舉行了論文報告會。當時與會的專家們對《漢語俗字叢考》給予積極的評價。郭錫良先生說：「這一課題完成得相當出色，這部書稿不僅很有實用價值，而且也是很有學術價值的。」何九盈先生說：「本書規模之大，創獲之多，可謂前所未有。」裘錫圭教授也說：作者「立論審慎，創獲極多」、「其成績大大超過了前人」（以上評語均見北京師範大學編《漢字所快訊》一九九六年第三期）。後來這部一百二十萬字的著作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並先後評獲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等獎、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二等獎。

張湧泉教授在講述個人求學的經過後，還特別強調指導老師的期勉與個人的研究興趣，是他決定研究領域時的重要因素。在他個人求學的經驗中，深切地認為，從事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時，不能只閱讀前輩學者整理好的資料，還要進一步與原本進行比對，才能對文獻有更清楚的瞭解。

張湧泉教授特別提到研究敦煌文獻時，幾個較具困難的地方，例如：敦煌寫本中有許多當時的俗字；再者是寫本中有許多以當時口語寫下來的字句，都是當時的俗語詞；此外，在敦煌石窟裏大多是寺院的文獻，所以與佛教相關的資料很多。因此，研究者若想要從事敦煌文獻的研究，必須先對當時的俗字、俗語詞以及佛教方面的義理進行瞭解，以這些知識為基礎，才能幫助敦煌寫本文獻的整理與敦煌文獻研究的工作。

張湧泉教授並介紹他手邊正在進行的敦煌文獻整理的工作情況，他表示由於希望敦煌文獻這部分的整理成果，能夠提供其他領域的學者作為發展、研究的準確資

料。但是，在敦煌文獻中屬於佛教的資料很龐大，所以整理的工作是以兩階段方式來完成。第一階段先將敦煌文獻中與佛教無關的資料，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方式進行整理；第二階段再來處理數量龐大的佛教相關資料。除了敦煌文獻的整理之外，尚有編寫《敦煌文獻語言大辭典》的計畫，此計畫的目的在於幫助讀者瞭解當時的字、語詞，以克服語詞時過境遷之後便難以理解的問題。

在訪談過程中，張湧泉教授和我們也暢談了兩岸大學教育及碩博士生學制上的異同處，像是考試科目與內容的挑選、修業課程的進度安排、每年碩博士生的錄取員額情況及未來共同交流的兩岸學制概況等等。在提到正、簡字體對於學生學習中國古代文獻可能有的情況時，張教授表示以漢字發展的趨勢來看，整體而言是趨向簡化的方向發展，因為文字本身是一種工具，所以越方便使用越好；但是張教授也強調，字形不能太過於簡化，過於簡化之後的許多字形相互類似，反而不容易區分。因此，簡化字形需要按照原本造字的系統，脫離了原有的系統，容易產生設計不恰當的情況，例如簡體字中將兩個不同的字合成一個字的情況，像是「頭髮」的「髮」與「發現」的「發」，還有「人云亦云」的「云」與「雲彩」的「雲」，在簡體字中都是同一個字形，這樣的設計就是可以調整的地方。張教授更以從事研究的角度來看，指出若是想要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無法閱讀辨識俗體字，就容易有判斷失誤的情況出現。

對於敦煌文獻的研究，張湧泉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認為，就俗字研究來說，之前學者對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少，所以隸書以下的近代漢字研究不多。因此，張教授本身對於俗字研究做了一些整理的工作，並將研究成果集結成書，出版了《漢語俗字研究》、《漢語俗字叢考》等書，就是要彌補這方面之前研究較薄弱的環節。而在敦煌文獻的整理方面，因為現在他所召集的工作團隊成員都是小學方面學有專精的研究者，所以在整理敦煌文獻，辨認文字之時，具有專業上的優勢。張教授表示其他領域的學者各有他們的長處，像是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領域之專長，但是就敦煌文獻的整理來說，以小學研究者來做整理、判讀的工作，會更具有學術的專業素養，其成果必定更加可靠。

在訪談的最後，張湧泉教授勉勵後進學者，在做研究時要能夠開闊自己的眼界，去認識新的東西，因為新的事物可以帶給研究者新的啟發，如果同一個研究領域一直沿襲著同一種研究模式，就缺乏開創與新意。不過張教授同時也提醒研究者，在吸取新的理論方法來看古典文獻時，要判斷新理論是否適合拿來討論古典資

料，做研究時雖毋須故步自封，但也並非囫圇吞棗地直接將新理論移植過來套用。

這次於浙江大學訪問張湧泉教授的對談與交流，就在張教授表達對後進學者的殷殷期盼中圓滿結束。

西子湖畔的午夜，正飄著霏霏的細雨，我們深深感謝張教授的盛情，能在我們即將告別杭州的前夕，特別在深夜裏撥冗蒞臨西溪賓館，接受我們的訪談。雖然和張教授暢談到午夜十二點，仍然意猶未盡，但又深恐影響張教授的作息時間，才依依不捨地將他送出浙江大學專家樓。望著細雨中張教授離開的背影，我們不只感受到學者對研究的執著與熱力，更令我們對他尊師重道的風範，油然升起無限的敬意。